

西方 传播学术史手册

A HANDBOOK OF THE HISTORY OF
WESTERN COMMUNICATIONS

主 编 胡翼青
副主编 吴 越 李耘耕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西方 传播学术史手册

A HANDBOOK OF THE HISTORY OF
WESTERN COMMUNICATIONS

主 编 胡翼青
副主编 吴 越 李耘耕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方传播学术史手册/胡翼青主编.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5

ISBN 978-7-301-25545-2

I. ①西… II. ①胡… III. ①传播学—历史—西方国家 IV. ①G206-0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33890 号



书

著作责任者 胡翼青 主编 李耘耕 副主编

责任编辑 周丽锦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5545-2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址 <http://www.pup.cn>

电子信箱 ss@pup.pku.edu.cn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65016

印刷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经销者 新华书店

730 毫米×980 毫米 16 开本 22.75 印张 396 千字

2015 年 5 月第 1 版 201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0.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电话:010-62756370

编委会成员

柴 菊 何 瑛 胡翼青 黄佩映 李耘耕

戎 青 唐 利 吴 越 解 佳 张晓星



目录

C O N T E N T S

导读 传播研究的星空 / 1

阿尔伯特·H. 坎特里尔(Albert H. Cantril, 1906—1969) / 17

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 1938—) / 22

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 1891—1937) / 29

阿芒·马特拉(Armand Mattelart, 1936—) / 34

伯纳德·贝雷尔森(Bernard Berelson, 1912—1979) / 40

卡尔·I. 霍夫兰(Carl I. Hovland, 1912—1961) / 45

查尔斯·H. 库利(Charles H. Cooley, 1864—1929) / 50

达拉斯·W. 斯麦兹(Dallas W. Smythe, 1907—1992) / 56

丹·席勒(Dan Schiller, 1950—) / 61

丹尼尔·勒纳(Daniel Lerner, 1917—1980) / 66

戴维·莫利(David Morley, 1949—) / 71

埃德加·莫兰(Edgar Morin, 1921—) / 77

爱德华·T. 霍尔(Edward T. Hall, Jr., 1914—2009) / 83

伊莱休·卡茨(Elihu Katz, 1926—) / 88

伊丽莎白·诺埃勒-诺依曼(Elisabeth Noelle-Neumann, 1916—2010) / 94

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 1922—1982) / 99

埃弗雷特·M. 罗杰斯(Everett M. Rogers, 1931—2004) / 106

乔治·格伯纳(George Gerbner, 1919—2005) / 110

乔治·H. 米德(George H. Mead, 1863—1931) / 116

- 格雷厄姆·默多克(Graham Murdock, 1946—) / 122
- 居伊·德波(Guy Debord, 1931—1994) / 127
- 哈罗德·D. 拉斯韦尔(Harold D. Lasswell, 1902—1978) / 133
- 哈罗德·伊尼斯(Harold Innis, 1894—1952) / 139
- 赫伯特·布鲁默(Herbert Blumer, 1900—1987) / 144
- 赫伯特·I. 席勒(Herbert I. Schiller, 1919—2000) / 150
- 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 1898—1979) / 154
- 詹姆斯·W. 凯瑞(James W. Carey, 1934—2006) / 160
- 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 1929—2007) / 167
- 约翰·杜威(John Dewey, 1859—1952) / 173
- 约翰·D. 彼得斯(John D. Peters, 1958—) / 179
- 约翰·费斯克(John Fiske, 1939—) / 184
- 约书亚·梅洛维茨(Joshua Meyrowitz, 1953—) / 189
- 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 1929—) / 193
- 库尔特·勒温(Kurt Lewin, 1890—1947) / 199
- 列奥·洛文塔尔(Leo Löwenthal, 1900—1993) / 205
- 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 1918—1990) / 211
- 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 1942—) / 217
- 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 1911—1980) / 223
- 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 1895—1973) / 229
- 麦克斯韦尔·E. 麦库姆斯(Maxwell E. McCombs, 1938—) / 234
- 迈克尔·舒德森(Michael Schudson, 1946—) / 239
-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 / 244
- 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 1931—2003) / 250
- 保罗·F. 拉扎斯菲尔德(Paul F. Lazarsfeld, 1901—1976) / 255
- 保罗·莱文森(Paul Levinson, 1947—) / 263
- 菲利普·J. 蒂奇诺(Phillip J. Tichenor, 1931—) / 268

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 1930—2002)	/ 272
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 1921—1988)	/ 278
罗伯特·E. 帕克(Robert E. Park, 1864—1944)	/ 285
罗伯特·K. 默顿(Robert K. Merton, 1910—2003)	/ 292
罗伯特·W. 麦克切斯尼(Robert W. McChesney, 1952—)	/ 299
罗兰·巴尔特(Roland Barthes, 1915—1980)	/ 303
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 1932—2014)	/ 309
西奥多·W. 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 1903—1969)	/ 314
托德·吉特林(Todd Gitlin, 1943—)	/ 322
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 1892—1940)	/ 327
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 1889—1974)	/ 333
沃尔特·P. 戴维森(Walter P. Davison, 1918—)	/ 339
威尔伯·施拉姆(Wilbur Schramm, 1907—1987)	/ 343
文森特·莫斯科(Vincent Mosco, 1948—)	/ 350
传播学谱系图	/ 355
后记	/ 356

导读 传播研究的星空

书写一本与传播研究有关的手册(handbook),就意味着两件事情同时悄然发生:其一是以我们的眼光去划定传播研究领域的边界;其二是表达我们的学科认同和专业立场。我们不能也不打算否认这一点。

有人会奇怪为什么我们不干脆用更为直白的方式来规定传播研究的边界,比如书写一本体系化的传播学教材。自1949年以来,施拉姆、他的许多弟子以及更多的弟子的弟子一直都在做这件事,而且他们也确实用自己的方式直接地圈定了他们所认为的传播学的边界。然而,我们并不认为这些教材完成了他们的使命。相反,他们关闭了传播学的边界,将传播学的理论探索变成了一种规范性的理论教条。施拉姆晚年曾经强调:“我们有时忘记了传播研究是一个领域,而不是一门学科。”^①然而,这一真理性的判断与他一生所做的主要工作正好是矛盾的。写一本关于这一学科的教材来规训该学科未来的知识生产者,这是一件多么困难和多么需要三思而后行的事,然而在传播学这个领域中,似乎这是件人人都能干的事情。思忖良久,我们觉得没有能力把这本手册写成一本书。

如果我们认定传播研究只是个领域,一个十字路口,那么

^① 参见施拉姆对贝雷尔森的回应:Bernard Berelson, “The State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1959, 23:1—6。

要划定传播学的边界,采用的方法就绝不可能是圈地,而是开放和探索,是对原有边界的挑战。在我们看来,如果想看到传播研究的边界,那么最省力的办法就是呈现出传播研究大家们的思想边界。这就是我们的方法,为传播研究画一张星空图。不过这个方法并不完美,除了它所固有的模糊性以外,它面对的最主要的问题是谁是传播研究的大家,标准是什么。然而它有着无可比拟的优点,因为它保持了一种开放和探索的姿态,因此可以不断地被补充。

在《美国传播研究的开端》一文中,施拉姆把拉斯韦尔、拉扎斯菲尔德、勒温、霍夫兰钦定为传播学的四大奠基人。他认为,这四个人的贡献为传播研究开辟了疆土,从而使得传播研究成为一个具有合法性基础的学科领域。然而,这种辉格史的写作方法,既没有看到传播研究领域已经存在了近一个世纪的各位思想先驱,也没有看到他同时代的各种伟大传播思想,这些思想有许多来自其他学科。与施拉姆故步自封、罢黜百家的传播学科观不同的是,我们认为,传播研究是一座多元思想交相辉映的学术富矿。^① 所以,本手册的宗旨以质疑施拉姆的标准作为起点并呈现我们认为对交流哲学有所创见的学者,这些学者起码对一至多种传播理论的提出与发展作出过积极的、具有开创性的贡献。但它因此就是不完善的,是内涵模糊的,是挂一漏万的,是需要不断补充和拓展的。我们要声明的是,这本手册是目前我们关于传播思想边界的看法,需要被补充和批评,而且本书必然是一个开放性的文本,会随着对传播思想史研究的深入而不断完善。

怎么呈现是另一个重要的问题。在这方面,戴元光老师主编的新作《影响传播学发展的西方学人》是一种厚重的方式。然而,厚重的论述常常会损伤相对的全面与信息的清晰度,这并不是手册的呈现方式。为了更为清晰和相对全面,我们采用了更为简单的呈现方式。在本书的正文中,当代经典传播学者(19世纪的思想先驱不在我们的描绘范围之内)将以词条的方式被详细描绘,每一词条都会向读者介绍这位学者的学术生平、对传播理论和方法的贡献以及对传播学科建制的贡献(有部分学者在这方面确实没有什么贡献,就不存在这部分内容),同时还有扩展阅读部分(多以英文原著为主)。这样既可以帮助读者了解词条中所叙述的人物大致有的一些什么样的成长经历、传播思想以及处于什么样的学术语境,也可以以此作为一个起点,引导读者

^① 具体参见胡翼青:《四大奠基人神话的背后》,《国际新闻界》2007年第4期和黄旦:《美国早期的传播思想及其流变——从芝加哥学派到大众传播研究的确立》,《新闻与传播研究》2005年第1期等文章。

进行更为深入的扩展阅读。^①

当然,这种叙事方法带来的问题也不少,比如说一个最主要的问题就是点与面的分离。因为任何描绘星空的人不能只描绘星星,而不去描绘星星背后的夜空。补偿的办法就是这篇导论以及书后的那张谱系图,尽管这些补偿是远远不够的。在导论中我们不仅要提及在词条中没有涉及的一些 19 世纪的思想先驱,而且要将学者之间的系谱关系和理论所属范式做一个简单的梳理。尽管我们无意再去讨论 20 世纪之前的伟大思想家和传播思想,但如果在导论中居然不对这些先在的研究做一些回顾,那么我们就是在以历史书写的方式消灭历史。

传播思想的先驱们

批判传统的奠基者——从黑格尔到卢卡奇

批判理论作为传播学学科话语建构过程中一个与传统学派相对立的理论范式在施拉姆之后的传播研究中获得了日益重要的地位。汉诺·哈特在《传播学批判研究》一书中把对批判思想的忽视理解为 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传播学发生危机的原因之一,在他看来:“传播学未能理解并克服自身思想史的局限,不仅未能解决已然站稳脚跟的传播学科的理论问题和方法论问题,而且未能认识到激进思想的潜力。”^②暂不论汉诺·哈特的看法是否有失偏颇,但他至少对批判理论对于传播学的意义做出了侧面的肯定。

当我们追溯批判理论的源头时,马克思和卢卡奇是不可不提的人物,而当把他们视为新哲学的开创者加以书写的时候,我们不能忽视那个为新哲学提供了最多思想养料的先驱——黑格尔。黑格尔把他的全部哲学看做是一个抽象的绝对精神自我异化和自我扬弃并复归自身的逻辑过程。黑格尔的哲学建立了一个无所不包的大全体系,他把人类历史、精神的自我生成和演进统统纳入了他的体系,而统摄这个体系的便是那个神秘的“绝对精神”。马克思抛弃了黑格尔客观唯心主义的预设,而把自己的哲学建立在对黑格尔的扬弃之上,他从黑格尔的哲学中发现了“绝对精神运动”的辩证法和历史性

① 需要特别声明的是,由于本书具有一定的工具书色彩,所以在词条中我们并没有注明引语的出处。所有引语均来自于词条中的延伸阅读,由此带来的麻烦请各位读者见谅。

② [美]汉诺·哈特:《传播学批判研究——美国的传播、历史和理论》,何道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96 页。

的概念并加以重新阐释,构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大厦。在马克思那里,黑格尔为他提供了辩证法和历史性的概念,列宁曾说:“不钻研和不理解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①马克思的《资本论》也正是建立在对辩证法的理解和运用之上的作品。在黑格尔那里,辩证法都是服务于“绝对观念”的自我运动的,而传播或沟通问题既是精神辩证运动过程中的主体问题,也是客体问题。“黑格尔要我们接受这样的观点,主体与客体纠缠,自我与他者纠缠,意义是公开的,而不是心理的。”^②而在马克思那里,交往形式的问题是一个历史性概念^③,它是建立在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实践的基础之上的,这就为黑格尔的辩证法找到了一个唯物主义或客观现实的基础,正如马克思所说,“德国哲学从天国降到人间,和它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人间升到天国。……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还可以描绘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④。

然而,马克思的批判却忽视了黑格尔辩证法中意识的主体向度,他把无产阶级的主体意识的觉醒当做不需要论证的历史过程。这一点被匈牙利的共产主义理论家卢卡奇敏感地发现,他重新唤醒了马克思主义中被遮蔽的主体环节,把历史重新建立在人本主义的立场上,提出了社会存在的本体论。卢卡奇对马克思的理解对后来的批判理论至关重要。卢卡奇认为:“总体范畴,整体对各个部分全面、决定性的统治地位,是马克思取之于黑格尔并独创性地改造出一门全新的科学的基础的方法的本质。”^⑤这在某种意义上退回到了黑格尔的立场,而从这个角度出发,卢卡奇借助韦伯的合理化观念和黑格尔、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展开了对资本主义“物化”现象的分析和批判。这条道路被后来的法兰克福学派所继承,在他们那里,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人的异化的批判深化为对整个启蒙理性和科学技术的拒斥,批判传统开启了后世传播学许多重要的批判母题,比如文化工业、媒介的意识形态化,以及传播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而黑格尔、马克思和卢卡奇正是这个传统的思想奠基者。

① 《列宁全集》第5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51页。

② [美]彼得斯:《交流的无奈》,何道宽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第111页。

③ “交往形式”是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使用的概念,在其后期著作中,这个概念演变为“生产关系”。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5页。

⑤ [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76页。

实证主义传统的开创者——孔德

孔德的思想与英国经验主义相类似,他们都排斥传统形而上学的先验观念,即认为不存在超越经验的天赋观念。这种思想来源于昌盛于19世纪的自然科学。孔德在当时欧洲最为发达的国家之一法国学到了实证和科学的精神,他同时也受到启蒙的感召,认为要建立不同于以往哲学的新的“社会科学”:“孔德旨在创建一种自然主义的关于社会的科学,这种社会科学既可以解释人类的历史发展,又可以预见其未来的进程。除了要建立一种能够解释人类运动规律的科学之外,孔德还企图阐明在具体历史时期影响社会稳定的条件。他的学说的两大支柱是社会动力学和社会静力学,即关于社会进步和社会秩序、社会变化和社会稳定。”^①

孔德的思想催生了新的以经验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在欧洲,孔德的思想被逻辑实证主义者所接受,“他们明确地把这样的科学的世界观规定为两个基本点:‘第一,它是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只有来自经验的知识,这种知识是建立在直接所予的基础之上的。第二,科学的世界概念是以一定的方法即逻辑分析的运用为标志的。’”^②迪尔凯姆在孔德思想的指引下,在《自杀论》中率先采用了量化研究的经验方法,并奠定了实证社会科学的基础。而在美国,实证主义成为早期实用主义哲学的思想之源。学者们综合了实证和实践的概念,皮尔士就把认识看做一个在实践中探究的过程。孔德的影响使得逻辑实证主义和美国的实用主义之间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1882年,逻辑实证主义先驱马赫曾在布拉格会晤实用主义创始人詹姆斯。自此以后,两人彼此倾慕,相互砥砺。而当20世纪30年代,拉扎斯菲尔德——这个20世纪最重要的实证主义工具制造者——从欧洲逃亡到美国以后,实用主义与实证主义在传播研究上的合流便水到渠成。

即使在今天,实证主义的传统依然把持着传播研究的主流话语,在这一系谱上形成的效果研究、受众研究造就了一批专家式的传播学者,并且形成了一个建制性的学科,推行专业性的高等教育。就这一点而言,孔德及逻辑实证主义对美国传播学可以说是功不可没。

^① [美]刘易斯·A.科塞:《社会思想名家》,石人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版,第2页。

^② 江怡主编:《西方哲学史·第八卷·现代英美分析哲学(上)》,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77页。

弥散的影响——达尔文主义和精神分析

在追溯传播学的源头之时,有两个思想因素是最难被归类和解释的,几乎在每个传播思想的流派中都能看到它们的影子,这就是达尔文主义和弗洛伊德主义。

达尔文主义是把生物学家达尔文和社会学家斯宾塞的思想统称的产物,两者的观点其实略有不同。然而在社会科学领域,斯宾塞产生的影响更大一些。斯宾塞所倡导的达尔文主义意味着一种对“进化”近乎偏执的信念,“在如何看待进化的问题上,斯宾塞和达尔文有着根本的区别。在斯宾塞看来,进化意味着进步……人类获得完美只是个时间问题。他进一步认为,进化原理不但适用于个体,而且适用于社会。斯宾塞将适者生存的观念用于社会,这就被称作社会达尔文主义”^①。

达尔文的进化论挑战了19世纪正统的思维方式,他所提倡的历史进化观念给了马克思重要启示,“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推崇达尔文的著作,并认为他们自己的历史科学最终是建立于达尔文的观念之上,但从我们的观点来看,最重要的是,他们也将社会历史划分成了一系列进化‘阶段’”^②。虽然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并没有成为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主线,但毫无疑问,社会进化中连续性和方向性的因素被多数批判理论保留了下来。与马克思类似,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也是达尔文和斯宾塞的重要追随者,“齐美尔虽然并不完全信奉进化发展学说,然而他早期的许多想法却与斯宾塞的思想非常接近,他相信人类从原始的群体生活逐渐演变到现代社会的个人自主发展”^③。齐美尔从微观的角度探讨了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团体、社会团体与社会团体之间的行为互动对社会的建构作用,而这些社会互动又反过来形塑个人。齐美尔坚持研究社会互动形式,虽然后期的齐美尔并不完全认同进化论的观点,然而进化论是研究齐美尔时不可忽视的一环,而这也是承继了齐美尔思想遗产的社会学芝加哥学派在探讨传播问题时,始终对个人互动对社会的形塑作用保持乐观的原因。从社会学芝加哥学派这一脉伸展出的伊尼斯

① [美]B. R. 赫根汉:《心理学史导论(第四版)》上册,郭本禹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35页。

② [英]彼得·狄肯斯:《社会达尔文主义——将进化思想和社会理论联系起来》,涂骏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8页。

③ [美]刘易斯·A. 科塞:《社会思想名家》,石人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版,第177页。

及其后的媒介环境学,似乎也无法完全摆脱进化论史观的影响。

同样地,社会达尔文主义对于适者生存的强调和对个体自我完善能力的笃信同新兴的资本主义美国是相容的。在这个强调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国度,社会达尔文主义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在美国早期实用主义者杜威或帕森斯的身上都不难看到,尽管帕克和库利反对简单的优胜劣汰说,但他们站在不同的角度对美国社会必然通过各种方式进化为完备的社会形态做出了论证,而进化论也自然成为整个美国传播研究的乐观主义来源。达尔文主义的影响不仅仅体现在传播研究的社会学取向上,也体现在传播研究的另一个支持性学科心理学上。进化论第一次把人类看做一般生物进化的一个特殊阶段,这就意味着对于人类和意识的研究将不必须带有先验的色彩,而可以把心理活动放在生物本能和行为的层面进行经验性考察,正如波林所说:“进化论对于心理学的发展影响巨大。这个学说不仅向物种特创说中‘创世纪’的权威发起挑战,以为人的身体得之于动物祖先的遗传,而且提出动物和人之间是否有连续性的问题。”^①在这里,特别需要强调的是进化论对美国心理学研究的影响,“达尔文的思想最终催生了一种美国特有的心理学——强调个别差异及其测量、强调思想和行为的适应价值、强调研究动物行为的心理学”^②。行为主义心理学为后来的传播效果和受众研究提供了科学主义的研究范式。有趣的是,这一研究范式的开创者华生也来自芝加哥大学哲学系。

在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对立面——人文主义心理学阵营,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心理学是一面旗帜。当华生主义在各个心理学实验室高歌猛进之时,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则在各种思潮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是非理性主义哲学的重要基石,却以匪夷所思的方式影响到了实证研究。由于强调公众是一群非理性和集体无意识的乌合之众,弗洛伊德受到了开创美国实证主义传播学的李普曼和拉斯韦尔等学者的高度推崇。这种理论被用来说明民众不能成为民主的真正主体,只有用精确测量作为武器的社会科学专家才能保障民主。尽管以拉扎斯菲尔德为代表的传播效果研究者短暂放弃了弗洛伊德的理论而得出了有限效果论的结论,但此后兴起的一些后实证主义强效果理论都在强调弗洛伊德理论的重

① [美]E. G. 波林:《实验心理学史》,高觉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534页。

② [美]B. R. 赫根汉:《心理学史导论(第四版)》上册,郭本禹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43页。

要性,比如格伯纳的培养理论、纽曼的“沉默的螺旋”等,催眠、移情、从众等精神分析的概念被用来解释传播的长期效果。

精神分析学说对于批判学派的影响显得更为复杂。在法兰克福学派发展的早期,弗洛伊德被看做一种重要的思想资源,以弗洛姆和马尔库塞为代表的学派成员将其思想作为研究工人权威主义人格的起点。这种影响一直延续到学派在美国的活动,甚至在人生的后半段,马尔库塞仍然在为完善弗洛伊德的理论而著书立说,将爱欲看做是人类自我救赎的终极手段。对此,罗杰斯的评价是:“法兰克福学派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从而为我们提供了今天的批判的传播理论。批判学派对于偏见的颇有影响的研究在阿多诺等人(1950)的《权威人格》中有记载,它代表了一种以量化心理学的方法来研究人格问题的精神分析理论。”^①不过,罗杰斯完全没有看到的是,弗洛伊德真正吸引法兰克福学派的东西是他的反启蒙思想,他的著名论断“人性是文明之敌”是如此深刻地影响到霍克海默、阿多诺和马尔库塞,以至于哈贝马斯在阿多诺六十大寿时一针见血地指出:“《启蒙辩证法》在那些最隐晦的段落中向没有压抑就没有文明的这种反启蒙立场做出了让步。”^②

20 世纪经典传播研究的两大路径

欧洲思想:从批判理论到文化研究

两次世界大战彻底改变了欧美国家的知识生态。长期作为西方思想策源地的西欧渐渐倾颓,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好多年才恢复思想的活力,而在托克维尔眼里没有什么文化的新大陆反而成为西方思想的中心。在战后的十多年中,欧洲传播研究领域曾一度沦为美国传播学的殖民地。一些重要的欧洲思想家如勒温、拉扎斯菲尔德在战争中逃往美国,在那里建立起了实证主义的传播学思想体系;而另一些批判传统的学者虽然也逃往美国,但他们的思想并不为新大陆所接受,最后还是在战后的欧洲尤其是新左派运动

① [美]E. M. 罗杰斯:《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殷晓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91页。

② [德]罗尔夫·魏格豪斯:《法兰克福学派:历史、理论及政治影响》,孟登迎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759页。

时期的欧洲开花结果。

卢卡奇之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为传播研究打开了一个新的视野,这其中影响最大、最深远的莫过于法兰克福学派。法兰克福学派以成立于1923年的法兰克福大学的社会研究所为阵地,以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哈贝马斯等学者为代表,在20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产生了一批重要的作品,其中有不少对传播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一学派基本上可以被看做是黑格尔和弗洛伊德两种理论传统在当代的延续。

1933年后,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学者们为了躲避纳粹,相继流亡美国。在那里,弗洛姆、阿多诺等人参与了一系列有关传播和权威人格的重要研究,这些研究与马尔库塞对发达工业社会对人的爱欲的压抑的分析一起构成了批判理论在微观维度上的研究话语,即对媒介宰制下人的心理脆弱性的批判。这之后,阿多诺与霍克海默合作,于1947年发表了《启蒙辩证法》。这部著作开启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的宏观新视野,把批判的矛头指向整个启蒙理性,在思想上拒斥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整个观念体系。在这之后,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如马尔库塞延续了这一批判主题,把发达工业社会的社会形态和文化形态描绘为“遗失了否定维度”的单向度的社会。这一批判主题为传播研究打开了一个非经验性的新视域,也是后来传播学研究中二元对立框架的思想源起,正如罗杰斯所说,“批判学派和经验学派对于大众传播在社会中的作用的看法极其不同。批判学者认为,大众传播被现存的制度用来控制社会,而经验主义学者认为媒体能够帮助改进社会中的社会问题”^①。由于法兰克福学派在美国期间坚持以德文写作,其理论不仅不为美国学者所了解,即使是英国与法国的批判学者,也都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才看到这些文献。对于许多欧美学者来说,他们是先看到了马尔库塞在20世纪60年代出版的《单向度的人》以后,才看到了《启蒙辩证法》,因此几乎可以这么说,是新左派运动让人们重新发掘了法兰克福学派。

对法兰克福学派的重新发现极大地推动了欧洲独特的传播研究。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学者为传播研究提供了迥异于传统社会学的研究母题,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对文化工业的批判和对传播媒介的意识形态的批判。这个批判传统来自于欧洲的理性主义,这一点被后来的文化研究和传播政治经济学所部分继承和发扬。以伯明翰学派作为起点的文化研究综合了来自欧洲

^① [美]E. M. 罗杰斯:《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殷晓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129页。

大陆的多元思想养料,除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文化研究还汲取了源自索绪尔的符号学和结构主义思想、英国新批评理论、话语理论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和霸权理论。文化研究关注在各种文化形式和文本中意义是如何通过表征系统运作并发挥作用的。^①与文化研究不同,同时在英国和北美兴起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反对只针对文本的表征分析,而强调回归对文化的政治经济基础的关注,“加拿大学者达拉斯·斯迈兹在1997年发表了一篇措辞严厉的文章,他认为欧洲批判研究的盲点是没有注意到电视的经济逻辑”^②。他们把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工业的意识形态的批判转化为对文化产业的批判,提出了诸如文化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等问题,把马克思主义与传播研究进行了有益的结合。

但相比于法兰克福学派的激进,文化研究和传播政治经济学都退回一步,它们或是把对传播的批判建立在文本之上,或是建立在政治经济制度之上,这极大地削弱了它们对传播与社会现实的阐释力。

时至今日,文化研究和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影响日渐全球化,并反过来影响到了美国的传播研究。尤其是文化研究,已经成为席卷全球的学术思潮。可惜的是,它的发源地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已在2003年被校方关闭,人去楼空。

美国路径:多元研究视野与其合流

谁也不会想到,当20世纪初来自欧洲的思想与新大陆上发达资本主义的新锐发生交汇后,会绽放出异样璀璨的花朵。这个花朵在德国纳粹的间接帮助下,又在30年代吸收了大量来自欧陆的养料,终于结出了丰硕的果实。时至今日,美国依然凭借压倒性的国家实力,把持着世界学术界的话语权,在传播研究领域也不例外。

如果追溯美国社会科学思想的源头,实用主义和芝加哥学派是绕不开的环节。实用主义综合了实证主义、达尔文主义和黑格尔主义等思想,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几乎成为美国的国家哲学,其对美国社会科学的影响直到今天还清晰可辨。实用主义以皮尔士、詹姆斯、杜威三人为代表。美国早期的实

^① 参见〔英〕斯图尔特·霍尔编:《表征——文化表征与意指实践》,徐亮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② 〔法〕阿芒·马特拉:《传播学简史》,孙五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0页。